

一

到了一个能够认出自己的年龄,突然就怕起偶然了。偶然的事不好说,说不清,没等想明白或许已卷在偶然的动荡里了,而等到事情过后,竟会觉得恍若隔世。不真实,很不真实,但或许又因此渴求它,因它制造了更多可能性。人为此陷入取舍的困境,是激励,还是寂灭。

2004年9月,银川——西宁,909次,2车4号下铺。青海湖,要去的话说了几年,这一次终于摇晃在车上。但还是觉着迟了。迟了什么,错过了什么,除了青海湖的天和水,想是没人知道,自己也说不清。

夜里3点,猛然醒了,其实一直恍恍然,极困倦,却无法睡去。一旁车厢门被呼啦啦推开又关上,睡意被一次次撞醒。洗手间水龙头没有拧紧,水滴答滴答像是滴在了额头上。卫生间门没法关紧,腥臭的气味铺天盖地。浑浊的夜,我坐了起来,不久,烦躁里倒是生出了些漠然。忍耐一些煎熬,并非这一夜。这晃荡的一夜其实是短的。

这样,那恍若隔世的不真实感就袭了上来。之前并未有此计划,原本是想去另一处,那里有一条地震带和一些遗址。但是否能见到这些无关紧要,紧要的是确定了一个方向,而失却方向是令人不堪忍受的。青海湖是完全相反的方向,它在我站在售票窗口时突然出现。一切就成为这一夜,浑浊的一夜,被我拥有、记住,若干年后我还将回忆它。它令另外一个方向的夜晚充满想象,令生命的另一个可能性在远处若隐若现。

二

青藏公路从这里开始,高原从这里开始。9月,这条路上的游人已经渐渐稀落,高原将归于宁静,归于安详的休憩。一个夏天的喧闹,它看到太多,听到太多。

湟水河浑得发黑,湍流着激情。油菜熟了,油菜花的烂漫总是要归于收割的劳作。一家四口,父亲蹲着割,母亲站着捆,女孩帮着捡,那男孩抬起头,死盯着车辆路过的车,心像是在远方。

山,山是近的,近的时候是严峻的父亲,人像犯错的孩子;山也是远的,远的时候是慈睿的祖父,人的顽劣和苦痛被他收拢、疼爱。

蜂箱,蜂箱候在路边,等候蜂子的归来,养蜂人神秘的脸庞,隐匿在帽檐的宽大阴影里。那些蜂子一定把高原最

庐山的房子

□董立勃

早想来庐山,一直没有机会。这一年9月,有个国际作家写作营,请了多个国家的作家来庐山。一共30多人,中国作家占了一半,我是其中一个。

想来庐山,原因不用多说,只要是中国人,识几个字,知道一点历史,都会想来。显然,想来这里,主要倒不是为了看风景。庐山的风景很好,没有到过也了解一些,很多的文人曾在他们的作品中描述过,甚至有那么几首诗,问几岁的孩子,都能背得出来。

一座山,只要足够高大、有树有水,怎么看都能看到诗情画意。而庐山有名,除了这些美景,还有一些东西,是在别的山上看不到的,比如庐山的房子。这儿之所以叫“庐山”,就是和房子有关。据说在周朝,一位高人上了一座山,周王有事,派人喊他下山。来山上找他,找不着,只找到一间茅庐。从此,这山就叫庐山。

山是自然成的,房子是人造的。人造房子,是为了住。不过,在山上造房子,不全是为了自己住。据说,数千年间在庐山造的寺庙有上百座,里边住的不是神仙就是菩萨,并且住下就再不走了。这会儿去庐山,还能看到它们,一个个都是当初的样子,一点儿也没有变。但我从不烧香拜佛,见了寺庙也只是在外边看看,很少进去。

在庐山顶上,有一个牯岭镇,这个镇上有一片房子。它们由许多别墅组成,因此这儿也叫别墅村。我想说的房子,就是别墅村的房子。说到这里,不能不说到一个人,他叫李德立,这是个中国人的名字,可实际上他是一个英国传教士。

不知在李德立之前,有没有外国人来过庐山。也许有人来过,因为只是来过,没有干过什么,留下什么。人要有名,就得干事,干别人干不了的事,干别人没干过的事。李德立就干了这样一件事情。

那年,李德立22岁,来中国传教,传到了江南,热得受不了,听人说庐山上凉快,就跑到了庐山,一上庐山,就被迷住了,想住下来,不想走了。不但自己想住,他还想让很多人来住。很快,他想出了办法。他租了一片4000多亩的山坡,并把这些地分成几百份,卖给了更多的人。很快,一幢幢带花园的洋式楼房像一幅幅油画,镶嵌在古老的山峰和树木间。

有了这些房子,庐山还是庐山,但庐山的故事,却有了更多的起伏。庐山有一座房子,叫美庐。这名字和美国没有关系,却和一个在美国留过学的女人有关,她叫宋美龄。因她的名字中间有个“美”字,所以她就把这所房子叫做美庐。

这栋别墅承载了很多重要的历史片段。当我在那个雨雾飘荡的下午走进美庐时,听到的是历史老人沉重的感叹。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后,狂妄自大的蒋介石在这个叫美庐的房子里,多次拒绝美国人马歇尔的调解,把自己逼上一条绝路。结果他不得不从中国中心的一座大山上退下来,一直退到了版图南边的一一个小岛上。在台湾,蒋介石和宋美龄一定会多次说到庐山,说起那座叫美庐的房子,并且一定还想着有一天重新住进去。可是这始终只是一种无望的幻想。

1959年,毛泽东上了庐山,听说美庐很不错,就走了进去,很有礼貌地说了一句,

委座,久违了,我来了。说这句话时,他的脸上带着笑。后来,毛泽东有一段时间住在了这里。还必须提到的是,中共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“庐山会议”。那天,我竟莫名地走进了会场,目光慢慢地从那些写着名字的桌签上移过。这时,和我一起走进来的作家们都不说话了。我们的年纪都差不多,都在同一个时候听到过来自庐山会议的声音。

李德立不在了,牯岭镇还在,那些别墅也还在。当初的主人们也不在了,可美庐还在。参加庐山会议的人,大多数都不在了,可那个礼堂那个会场还在。人活不过房子,人走了,房子不会走。看不到人,可以看房子。人走了,但什么都不能带走,他们的名字和他们做过的事情都会留在房子里。他们活着时的一些人们无法知道的秘密,在他们离开后被不断地寻找出来。只是不管怎么找,总会有些秘密找不到,就像在庐山看风景,总是会有些风景被雾遮掩,让人看不清,雾再重一点,会啥都看不见。

在山上待了几天,天天能见到雾。雾会把许多东西藏起来,包括那些房子。早上起来,或者黄昏散步,与庐山团团湿雾相遇。那会儿,除了自己,似乎什么都消失了。一颗心顿时有些慌乱,赶紧快步走,想走出云雾。结果,不但没有走出来,反而陷得更深。于是,一些从来没有过的感觉,就让你身心兴奋起来。谁能说云雾不是庐山的魅力之一,正如那些房子让庐山变得更加神秘和丰富。别墅村早已成了庐山风景的一部分,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。

说到庐山的房子,有一座我不能不说。早在多年前,一个叫赛珍珠的外国女作家,她写中国,写中国人,写成了一个大作家,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从那时起,我就想看她的书。每次进书店,都会看有没有她的书。可不知为什么,从来没有找到过。问别人,别人说,国内出过她的书。我一听,不由得会生气——想得到的东西,自己得不到,不能不生气。

上到了庐山,才知道赛珍珠原来就在庐山长大,她的文学路也是从庐山开始的,获奖的小说《大地》就是在庐山的一座房子里写出来的。刚一听说这事,我还真有点不敢相信。直到走进了那间房子,看到了她睡过的床、弹过的钢琴、坐过的椅子、用过的打字机,才明白心里边一直敬仰的作家原来离自己是那么近。

在纪念馆里,有赛珍珠的书,一问是可以买的。马上买了一套《大地》系列。这么多年我一直想买这套书,可就一直没买上,是老天故意做了安排,让我来到庐山,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得到它。

连着几天,除了看风景,就是看赛珍珠的书。书里的风景,似乎更吸引我。看完了《大地》,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每个中国作家,都该去看看。看过了也一样会明白,为什么许多年来我们中国作家一直得不到这个奖。

自有这个别墅村,有了赛珍珠,庐山就不仅仅是一座中国名山了。世界名山大就会由庐山发起,已在庐山举行了两届,再次证明庐山已经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世界上山了。

许多年前,还没有我,庐山已在。许多年后,我来了,庐山还在。我知道,当我离开时,庐山不会记得我。不过,我不会因此不高兴。相反,我会感谢庐山。因为,来时两手空空的我,走时却收获了许多。我不仅带走了庐山,还带走了那些房子,它们被我装进了心里,让我一下子觉得我好像高了一点、重了一点。

青海湖

□阿 舍

细微的秘密告诉了他,他所做的就是将秘密装进蜂箱然后出售。只是那秘密是另外一种语言,除了蜂与养蜂人,无人能听懂。

牦牛,牦牛比想象中小许多,也倔强许多。它们低着头,似乎从不抬头,倔强地做着高原上最强大的耐寒者,不屑视线、不屑语言。

羊群,羊群很远,在山坡上。我猜它们不只是为了吃草。山坡的顶端有云,那云奇异得很,一阵儿和羊儿们一样温顺,朵朵洁白,一阵儿又粗重地压在山脊,遮天蔽地,堵得人心口沉郁。或许羊儿们想跟云靠近些,摸摸这些飘忽不定的幻梦。

只是不会有鸟儿,鸟儿在7月离去。鸟儿离去的青海湖,海子说:这宝石的尸体。

三

青海湖边,到处都是世俗的语言、世俗的笑容、世俗的步伐。世俗不该受到指责,它温暖、踏实、令人安心,它使颠簸心酸、漂漂泊泊。选择安心还是独泣,湛蓝的湖水不能作答。湖水默然,只有一双令人省思的眼睛。

两个女人在草地上拍照,一个稍胖的短发女人兴高采烈,吐字狂妄蛮横,而她快乐吗?她发音标准,地道的北京话。

两个男人和一个“阿喀”(藏语:僧人)边说边走,阿喀像是个导游,穿着朱红色僧衣,白白净净,和蔼可亲。这两个男人从深圳来,对阿喀十分尊敬,称阿喀为活佛。风马旗前,他们让我帮拍三人合影。

我曾遇见另外两个阿喀,去塔尔寺的路上,他们与我同行,是两个医学阿喀,只会简单的汉语,从桑科草原的拉卜楞寺来拜佛。我问看病收钱吗,他们摇头,用孩子般的认真说:“不收钱,为人民服务。”

大伙都走了,湖边才变得安静,有风吹过,湖水像起潮的海水,浪跟着浪,不紧不慢地拍打,哗啦啦。这样就更静

了,静得能听到很远,很远处有争吵声,是导游在和游人争执。湖水暗了些颜色,天也暗了些。

湖边有藏民拉着牦牛请游人拍照。瘦小的藏族男人见我独坐,来请我惠顾他的生意,木讷又诚挚。他的牦牛不是很漂亮,不像另一家的毛色纯白。他不会拍照,我简单地教他。骑上牦牛,听到咔嚓几声,我便下来付钱。他谢了我几次,然后牵着牦牛渐渐走远。

晚间临睡前,打开相机,翻来覆去地找,却不见我骑牦牛的照片,倒是有几张莫名其妙的蓝天白云照,在蓝天白云下只有一缕我被风吹起的头发。我快乐地笑了,被藏族男人笨拙的幽默惹笑了,然后渐渐睡去。那房间的冰凉或灯光的清冷,被淡忘在梦的惊悚里。

四

她们向夕阳走去,夕阳落处是她们的家。她们俩是高原的女儿,梳着细麻麻的小辮,脸儿又黑又红。鲜艳的藏族服装裹着四五岁的小身躯,那身躯在高原的夕阳下快乐地移动。

她们跟在我的身后,不停地 说:阿姨,我们照张相吧。已经是很标准和清晰的普通话了。我不照。当再碰见她们,她们又快乐地跑来说:阿姨,我们照张相吧。我又拒绝,她们又快乐地跑开。我这样快乐地拒绝她们多次,她们快乐地跑开多次。她们已经习惯被拒绝,不在乎被拒绝。

后来,我正拍照,她们突然又快乐地闯进我的镜头,我没法再拒绝,就快乐地将她们的收在我的相机里。听到咔嚓的声音,她们迅速走到我身前,异口同声说出一个词:给钱!我被她们的直接吓了一跳,但还是觉得快乐,就在她们伸出的小黑手上每人放了一块钱,她们眨眨眼睛走开了。后来,不知道又遇见她们几次,她们还是那么快乐,还是不依不饶地说:阿姨,我们照张相吧。

她们住在湖对面的草原上,每天经母亲带领,早晨来到湖边,迎接太阳,也迎接游客;傍晚游人渐稀,她们随夕阳而去,回到帐篷和营地,然后进入快乐的梦呓。从草原到湖边,一条不长的路上,有她们幼小的成长。阳光下,母亲教会她们追逐太阳,也教会她们取悦游人。母亲把梦想与生活都告诉她们,然后等待她们长大。没有多少年,她们长大了,健壮的小身躯变得婀娜许多,眼睛里会有湖水的沉静,身体里会有阳光的热情,长大的她们,有的会放弃梦想,有的会守着梦想。



村庄的黄昏

□黄金明

离开村庄多年后的事了。

每年的冬天,我都是一段时间要在山坡上收晾晒的萝卜干。山坡上长着铁芒箕和茅草,异常茂盛,母亲先在上面铺一层稻草,才将萝卜条撒晒在稻草上。在人们的眼中,稻草乃是清洁之物,而山坡上的杂草却有些肮脏。落日在慢慢褪色、变淡,最终坠下了山冈的另一面。在它消失的地方,在那些光线离去留下的空隙,黑夜迅速地填充并洋溢。我被那个不可挽留地滑落的红日抓住了。红日的周围汹涌着无数朵金黄或紫红的云彩,那吹过我头顶的风也吹过了山冈,云朵在翻滚着、绞缠着,我宁愿相信那些金属浇灌般的云朵也在被风吹抖动。耀眼的霞光穿透了厚实的云层,那些悬浮而凝重的云彩仿佛佛红的钢铁在流淌。是的,落日是一个就要熄灭的熔炉,而它在冷却之前仍要将这些云朵的金属冶炼。

在乡村,我曾多次看见过这么滚烫的红日、这么滚烫的云朵,连我的四肢也感到了一片灼热,它们几乎要使西边的那一角天空熔掉!火烧云通常发生在炎热难当的夏日,这么壮丽的景象发生在冬冬十分罕见。我脚下的稻草仿佛变成了一张草席,正在飞离山坡,仿佛要

就这样回了故乡,因为一个对我至关重要的消息:母亲住院了。

安居津门16年,平时甘津两地步履匆匆,往往避开中国式的春运洪峰。这次西行,形如在春运的风口浪尖上,一个趑趄,不提防跌入故乡的正月。

本当年三十津门依旧,举家品看春晚。可这消息这般从故乡传来,脑海里顿时白浪滔天。通过手机预定机票,方知天津到西安的机票早已售罄,西安到天水的航班因雪叫停,高速公路封门关闭窗口。只有借道北京的航线了。归途,成为一条漫长的神经,紧紧地绷,从这头直至万水千山的那头。

飞机、大巴、火车,在四面开花的爆竹中颠簸。回望窗外,却发现窗外的一切,也在望我。华北干燥如柴,北大大雪弥漫。正月初一,天涯苦旅。中国年,第一次把我排除在外。大年初二的凌晨一点,沉重的行李箱伴随我直奔监护室。母亲在昏迷中喃喃自语。我一时无言,心情有种被反复碾压的碎感。

后来的20多天里,一切陪护像是编入了既定程序:输液、吃药、喂饭、按摩、擦洗身子……周而复始中,我和弟妹无师自通地成了熟练工。无意识的自觉和自知,在亲人们默然无声的忙乱中弥漫;一句半句的轻声慢语,呼应着眸子里闪烁的焦灼、彷徨与期待。

早晨从第一次服侍喂药开始,阳光会透过纱窗进来;晚上从最后一次擦洗结束,月亮会挂在南山。目光像正负极,聚焦最多的,是母亲那张被花白头发映衬的脸,还有24小时扎堆儿在空中的输液瓶。无色透明的液体,是从天而降的悄悄话,滴答滴答,让生命的全部密码和呼唤,在母亲的血管里行走、漫游和叩问。

面对寒霜,不习惯让别人一起陪着我着凉,我有意让消息“闭关锁国”。但故乡毕竟是故乡,心灵有感应的人,最终还是探知城南一隅的我在落寞中手足无措。于是,从监护室到10楼3号单间病房,故乡的作家、诗人朋友们以及老同学、老同事从生活的缝隙里匆匆走进这白色的世界,走进我感情的调色板。从第一束鲜花送到病房,直至最后一束,花香始终传递着一种柔软的气息;电脑音频播放的,是故交专门为母亲下载的秦腔唱段;床头,是诗人找来的养生类刊物;案桌上,是朋友精心熬制的乌鸡汤……一番寒暄之后,话题里布满了人间烟火:家长与里短,前世与今朝。面对每一位把祝福送进病房的人,我发现自己还是可以微笑的。还发现,今冬,只不过,才是个冬。

许多手机短信,至今保留完好:“几点几分,医院等我,看望阿姨”,“出来喝酒,轻松一下”,“如方便,陪你熬夜,一起说说话”,“把衣服换好,我拿家里洗”,“来我家吃鸡丝馄饨”……一起走过或没一起走过的朋友,是十足的心理医生,在千方百计让我走出心情的洼地。

有那么几次,我把彷徨融入茶屋的夜里。窗外,不知此时的月,是否能从天水照到天津去。那里,我的宝贝小骏马同学,前一天还信心百倍地给我打电话:“爸爸,你就听我在天津围棋大赛上的好消息吧!”不料第二天却因高烧腹泻,黯然退场,备战半年的艰辛付之东流。想象得出,小英雄的两行清泪,咸如大海。

25天,破了我在故乡逗留的记录。天津有人发来短信问讯,我恶作剧地谎称早就调回西北工作了,对方大惊,短信曰:“要哭了啊!”我昏昏中警觉,温馨与牵念,原来不仅属于故乡。

为了换洗和会客,有5个夜晚是在宾馆和亲友家住,20个夜晚是在医院。平日专程或途径故乡,往往与母亲匆匆一见,即匆匆告退。就在那份短暂里,也免不了磕碰与争吵,而这次我切实做到服务与服从的结合,话题上更是百依百顺,比如秦腔、陇剧。母亲自幼好戏文,独自整理过百种秦腔戏文,此番,用微弱的声音说:“很想以《璇玑图》的诞生为背景,把天水女子苏若兰和窦滔的故事搬进秦腔戏。”我明知难,却好一番随声附和。病房,难得变成了和谐社会。

故乡的年,很像个年,奔正月二十了,大红灯笼依旧,爆竹照样鸣奏。窗外时不时飘舞着蜜蜂一样的小雨雪,发酵着早春的萌动。南山上的一株株柏槐,密匝匝的,有一种覆盖的力量。楼后,被故乡人誉为母亲河的藉河在流淌了2700年后,变成了如今的藉河风情线。我亲眼看到,冰先是一点点,再是一片片的,融了,化了,并迎来了第一批唱歌的水鸟。

在这分分秒秒里,我的母亲下床了,能走路了。我和弟弟扶她到窗前,她笑了,说:“人间,原来还是老样子。”“是,来来往往的,还是几千年前的那些人。”我附和着。母亲对我的表达表示满意,说:“等我好了,就可以游世了。”

返津,笔落至此,窗外的海河之畔,竟落下了第一场雪,纷纷的。

还在消失前的一刻,使卑微的屋顶显现了神性,使人世间的一切显露光辉。萝卜条在日光的映照下逐渐变得结实而金黄,它们内部的水分已被烘干一空,它们在暮色中看上去有点像金条。这些稻草和金条,通常被比喻成两种对立的事物,但此刻我却觉得彼此是如此接近,或者说也没有什么分别。这一次,我一直干到天黑,才将萝卜条收拢起来。一只萝卜晒成萝卜干后,它的体积大大缩小,形状也由长圆锥形变成了扁平的长条状。之所以将鲜萝卜腌制成萝卜干,并改变它的味道,我想是为了更便于存放。

在另一个夏日暮晚,我从求学的广州回到村庄,我躺在彩霞照耀的山坡上,从裤袋掏出一本叫《偶像的黄昏》的小册子。我望着天空、云霞、落日 and 远山,暮色愈来愈浓,村庄的屋舍略显模糊,有的房子透出了灰暗的灯光。我第一次意识到,黄昏的具象与抽象,黄昏的符号与实质,黄昏的光芒对应着转瞬即至的黑暗,黄昏的厚重与华美也将转眼即成记忆。至少,它有着更多的含意,而不仅是我所目睹的东西。

多年之后,当我回忆那个黄昏、那本书以及我当时阅读的情景与思绪,我似乎领悟了那个启示——我有责任在凤凰村被暮色完全笼罩之前,将天上巨大的辉煌和大地的安详呈现出来,使之成为相对固定的记忆。黄昏之后,是不可避免的黑暗像铁锅倒扣下来,那是乡村的夜晚,连星光都在揭示这是真正的漆黑。